

红色收藏



红军使用过的榆木炮(山西烽火抗战博物馆藏)

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明确提出党的基本策略任务是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提出了“抗日反蒋、渡河东征”的口号。

1936年2月17日,红军发表《东征宣言》,以“抗日先锋军”的名义发起东征。东征主力分两路强渡黄河,所到之处打土豪、分财物,筹粮筹款,扩大红军,至5月5日,完成了既定任务,胜利结束东征。

红军东征历时75天,转战山西50余县,播撒革命火种,迫使“进剿”陕北的晋绥军撤回山西,使陕甘苏区得以恢复和巩固。红军东征在山西吸收新兵8000余人,缴获各种枪支4000余支、火炮20余门,组建地方游击队30余支,筹款30余万元,并在山西省20余县开展了群众工作,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扩大了共产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壮大了抗日武装力量,锻炼了部队,增强了红军的战斗力,为全面抗战爆发后奔赴抗日前线打击日本侵略者奠定了军事基础。

红军时期的战士们大都武器装备简陋,没有重武器,只能靠大刀、长矛、土枪冲锋,导致作战经常陷入被动。面对这样的处境,红军就地取材,找来木匠和铁匠,将榆树树皮去掉,沿树心部位纵深掏凿出直径2.5寸左右的洞,作为炮膛。在炮膛底部钻出一个筷子粗细的孔,作为引信眼。再让铁匠打制了几道铁箍,分段紧紧地箍住“炮身”,最后装上用以稳定的支架,一门榆木炮就做成了。榆木炮的出现,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红军火力装备上的不足。

如今,这门征集于山西柳林、见证过那段革命岁月的榆木炮陈列于山西烽火抗战博物馆,虽陈旧斑驳,但其展现出的革命智慧和战斗情怀,为我们提供了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精神力量。

榆木火炮红军造

高林



李香林捐赠的1963年、1966年新兴力量运动会纪念章(山西省体育博物馆藏)

山西运动员李香林,曾是中国女篮的风云人物,是太行山里飞出的“金凤凰”,更是山西体育界的骄傲。

山西省体育博物馆陈列着李香林捐赠的“1963年新兴力量运动会纪念章”“1966年新兴力量运动会纪念章”各一枚,这两枚纪念章,记录了她在体育生涯的辉煌时刻。

1944年,李香林出生在山西孟县的一个小山村——下鹤山北村。12岁,她读高小,170厘米的身高,在同学们中间,显得鹤立鸡群。因此,几乎全孟县都知道了鹤山有个小“女巨人”。

山西姑娘60年前——驰骋球场为国争光

李时霖

时任孟县县委书记赵锐偶然间听闻下鹤山村有个身材高大、擅长体育的女孩,便推荐她去了设在太原的山西省体工队。加入省体工队后,经过刻苦训练,1960年,女篮国家队选中了李香林,那年,她只有16岁。经过两年基础训练和名师指点,李香林获得了巨大的进步,正式进入国家队服役。

1954年后,时任国际奥委会主席艾弗里·布伦戴奇蛮横无理,公然违反《奥林匹克宪章》,制造“两个中国”,引起中国体育界人士的愤慨。为了维护祖国的统一,1958年8月19日,中国奥委会发表声明,正式断绝与国际奥委会的一切关系,以示抗议。为摆脱国际奥委会等组织的控制和歧视、冲破西方大国体育垄断,时任印尼总

统苏加诺倡议,中国、苏联和10个亚非拉国家共同发起了“新兴力量运动会”。

首届新兴力量运动会于1963年11月在印尼雅加达举办,近50个国家的运动员参赛,其中,中国代表团派出了229名运动员。我们运动员非常珍惜参加国际比赛、进行交流学习这来之不易的机会,奋勇拼搏,最终获得66枚金牌、56枚银牌、46枚铜牌,位居奖牌榜第一,还刷新了举重和射箭两项世界纪录。

当时,李香林已是中国女篮国家队的主力中锋队员。从小组赛到决赛,中国女篮分别和49个国家的对手对阵,李香林反应灵敏,攻防兼备,凭借着自己的身高优势,与队友配合默契,与队友一举拿下了第一届新兴力

量运动会的女篮冠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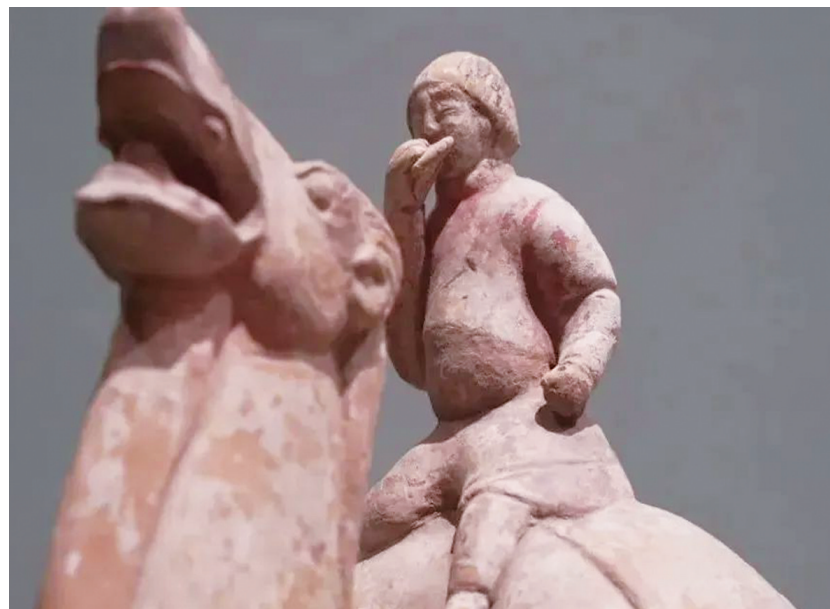
1966年11月底,第二届新兴力量运动会在柬埔寨金边举办,中国女篮再次出征。这一次,李香林和队友们又一次站上了女篮冠军的领奖台。

1970年,李香林从国家队退役,分配至山西省榆次液压件厂。1973年,她重返山西省体工队。从此,她在山西女篮省队教练的岗位上工作到1980年,随后转到二线工作。退休后的2008年,她还有幸成为了第29届北京奥运会的火炬手。

李香林为山西省体育博物馆捐赠的两枚“新兴力量运动会”铜质纪念章,记录着她体育生涯的辉煌,记录着新中国体育事业走过的艰辛路程。这两枚纪念章,将激励广大运动员不负众望、拼搏奋进、为国争光。

风餐露宿骑驼商

李君



胡人吃饼骑驼俑(山西博物院藏)

一只骆驼昂首嘶鸣,双峰间驮着的皮囊里装满了丝绸锦帛。骑骆驼的人,深目高鼻,胡人样貌,头戴圆毡帽,手中拿着胡饼,一边赶路一边吃,嘴里仿佛说着“真香”。

别看这个胡人俑看上去憨憨萌萌的,背后的历史可不简单。

这件胡人吃饼骑驼俑出土于太原市西南郊的隋代墓葬之中,墓主人为斛律彻,去世于隋开皇十五年(595),葬于开皇十七年(597)。隋是魏晋南北朝进入盛唐之间承上启下的过渡期,为唐代与各异域文明兼容并蓄的恢弘气度奠定了基础。这一阶段的过渡性历史特征也反映在这件陶俑身上。

具有浓厚西域特色的胡人吃饼骑驼俑出现在隋代晋阳是有特殊含

义的。首先是时间特殊,它出现于北朝晚期到隋唐这一由乱世向治世的转折时期;其次是地点特殊,它出现的晋阳地区是北朝时期丝绸之路上的一个重要节点。胡人身着圆领窄袖胡服,骑坐在高大的骆驼上,浓眉高鼻深目,左腿平伸,右腿弯曲,左手握缰绳,右手拿饼,通过胡饼、骆驼、丝绸、皮囊,加上浓眉高鼻深目的胡人,可以判断陶俑刻画的是一位往来于丝绸之路上的胡商。

北朝时期居住于中亚地区的粟特人因善于经商而被称为胡商。胡商俑出现在隋代的晋阳地区,生动形象地再现了丝绸之路上的商人往来络绎不绝的盛况。

《后汉书·西域记》曾用“胡商贩客,日款于塞下”描绘当时的丝路贸

易。隋唐统一之后,丝路贸易更加繁荣,吸引了大量粟特人进入中原,出现了“伊吾之右,波斯以西,职贡不绝,商旅相继”的场景。汉代到隋唐时期丝绸之路上的贸易往来绵延不绝,太原地区出土的这件陶俑只是这段历史的一个缩影。

胡人吃饼骑驼俑又是如何出现在太原的斛律彻墓中的呢?

斛律彻是北方高车(古代北方少数民族,汉代称为丁零,南北朝时称高车或敕勒)人,曾任北齐假黄钺、使持节、相国、朔州刺史等官职,其远祖是敕勒部的首领,后率部投附北魏,其曾祖父斛律金官至北齐丞相,祖父斛律光为北齐著名的大将,隋代统一之后斛律家族“品命如前……还依前授,加右车骑将军”,体现了当时的斛律家族与北齐和隋代统治阶层关系密切。斛律家族墓葬出现在太原地区,是古代北方少数民族南下的实证。太原古称晋阳,是东魏北齐时期的霸府别都。丝绸之路之上党过太行,途经晋阳进入当时的都城郟城,由此可知晋阳地理位置的特殊,体现了当时丝绸之路贸易的繁荣以及中外各民族的往来流动。

除了斛律彻墓之外,在张肃俗墓、娄睿墓和徐显秀墓中都出土有载货载人的骆驼俑。娄睿墓墓道壁画中有四人五驼组成的胡商驼队图,徐显秀墓出土的极具西域风情的蓝宝石戒指等都说明了北朝时期中外文化交流的频繁。除此之外,云冈石窟由北魏孝文帝在北魏都城平城(今山西大同)开凿,其18窟北壁东侧胡风梵貌的弟子、12窟主室南壁的胡商队伍,以及石窟中随处可见的忍冬纹装饰、琵琶、箜篌、箏篥等十种西域乐器,无不展现了当时丝绸之路贸易往来的盛况。



唐母子俑(左,陕西历史博物馆藏)和东汉哺乳俑(右,四川博物院藏)

母爱永恒,有很多文物表达了对父母之爱的歌颂,体现出感恩父母、孝顺长辈的理念。

右上图这件东汉哺乳俑,身着交襟长袖,盘坐,高梳发髻,戴头巾,面带微笑,左臂环抱婴儿,表现出一位母亲的慈爱形象。看到她,能够真切感知“养儿方知父母恩”。

在西安的唐代墓葬中,不乏表现母子亲情的陶俑——母亲抱着婴儿,婴儿依偎在母亲的肩膀上,母亲侧脸贴着孩子,脸上充满幸福的笑容。左上图这件母子俑,红陶质,模塑成型施彩。陶俑梳峨髻,上穿交领窄袖长衫,下着及胸曳地长裙,臂弯里有一个可爱的婴儿靠在母亲右肩膀上,体现出浓浓的母爱。

下面这幅《贤母图》是清代康涛的绘画作品,从此图题款“临民听狱,以庄以公。哀矜勿喜,孝慈则忠”,可知此为贤母向即将离家赴任的儿子所作的教诲。画家以高超的笔法将其母严肃训诫却又暗含离别伤感之态,儿媳恭顺侍立而又对丈夫依恋不舍之情,儿子恭敬聆听却踌躇难离之意,刻画得生动传神。画风严谨,设色清淡,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清康涛《贤母图》(首都博物馆藏)

母子情深

刘芳源

艺术典范华严寺

辛覃懿

华严寺位于大同市中心的大西街,寺内主要建筑有大雄宝殿(上寺)和薄伽教藏殿(下寺),其建筑、塑像、壁画、壁藏、藻井等,都是我国辽金艺术的典范。

华严寺大雄宝殿始建于辽代,“保大之乱”(1122)时毁于兵火,金天眷三年(1140)依旧址重建。殿身东向,大殿面阔九间,进深五间,单体建筑面积达1559平方米,矗立在4米余高的台上,是现存古代木构宗教单体建筑中规模最大者。

其檐高9.5米,庑殿顶,正脊上的琉璃鸱吻规模甚大,高达4.5米,北端鸱吻系金代遗物,历经风雨,至今光泽灿烂。

殿内采用减柱法,减少内柱12根,扩大了前部空间面积。殿内有五方佛和二十诸天等明代塑像,四周为清代罕见壁画。顶部天花板彩面共973块,大部为清代制作,所绘圆环、龙凤、花卉等图案,极富变化。

薄伽教藏殿,意为佛教的藏经殿,建于辽重熙七年(1038)。九脊顶,外檐柱头为双抄重拱,计心造五铺作,式样简练。殿内环列壁藏及天宫楼阁共计38间,分为为二层,上下两层斗拱计有18种之多,其中柱头铺作为双抄双下昂七铺作,是现知辽代斗拱中最复杂的一种,殿后壁当心间悬“天宫楼阁”五间,与左右壁藏上层连接,玲珑之致,该小木作建筑,系模仿木构建筑按比例缩小制作,实为辽代建筑的精品,为目前国内仅见。

殿内中央设凹字形砖台,台上有彩塑31尊,其既有丰满圆润、端庄安详的唐世风韵,又不乏浓郁的生活气息和富于个性的宋代特色,为辽代作品无疑。

一尊胁侍菩萨,合掌露齿,莞尔而笑,光脚立于莲台之上,衣饰飘带流畅自如,尽显婀娜多姿的神韵,我国著名艺术史家、学者郑振铎称赞其为“东方维纳斯”。



华严寺

太原壁画中的“剪刀手”

邢晓梅



太原市晋源区唐代壁画墓西壁侍女图



太原市万柏林区唐代郭行墓《树下老人图》(太原北齐壁画博物馆藏)

现在年轻人拍照,常会将中指与食指竖起,比成“V”的形状,表胜利、开心之意,人们戏称此手势为“剪刀手”。但这个手势,居然出现在太原的唐代壁画墓中,让人在诧异之后忍俊不禁。

1987年7月,为配合太原化工厂基建施工,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市晋源区金胜村(今属晋源区)附近,发掘了一座唐代壁画墓。墓中西壁有一侍女,高约1米,面相丰满,头梳高髻,额插花钿,身着黄地黑花曳地长裙,外罩红色对襟半臂衫,足蹬高头如意履,神态怡然。最为引人注目的是,侍女左手持一根“Y”形的长杖,回身向后,右手向上伸出两指比出了一个“剪刀手”。

无独有偶,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2019年在小井峪发现的唐代郭行墓中,也绘有一位动作相同的侍女。她头梳螺髻,身着襦裙,外披深红色峨眉,足蹬高头履,与金胜村唐墓中的侍女一样,右手也持一根“Y”形长杖,左手抬起比出一个V形的“剪刀手”。郭行墓是迄今为止太原地区发现的规模最大的唐代壁画墓,墓主人为唐代恒州刺史郭行,太原人,曾跟随唐太宗征战,92岁辞世。

据太原考古资料显示,在太原晋

源区和万柏林区现已发现的唐代壁画墓中,类似的“剪刀手”造型为数不少。

如,郭行墓东壁甬道的男侍,左臂轻抬,左手食指和中指竖起,右手执笏板,置于胸前。西壁甬道侍女,左手收于胸前,右臂轻起,右手食指和中指竖起,其余紧握。

太原唐墓中常见的《树下老人图》中也有多个“剪刀手”造型。这些老翁大都面容丰满,颌下留须,身着长袍,脚蹬高头履。有的左手向上竖起中指和食指,有的右手伸出两指指向树枝。有的面带微笑,有的若有所思……

据了解,“剪刀手”流行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代表胜利(Victory)。而太原唐代壁画墓中发现如此之多的“剪刀手”造型的人物,说明“剪刀手”的历史更久远,在我国的唐代,它就已经“流行”起来了。